

論王鼎鈞散文的移民書寫： 以《海水天涯中國人》、《看不透的城市》為例

陳昱蓉^{*}

摘 要

20 世紀的華人因戰爭、經濟、外交等因素，導致大量移民跨越國境，許多移民作家與作品亦相應而生，譜繪了時代的認知地圖。王鼎鈞（1925~）的經歷與書寫極具代表性，他在大陸山東出生，因戰禍飄蓬多方，並於 1949 年遷台，又於 1978 年擇美國安居。數度遷徙帶給他恆久的疏離失根之感，而巨大的文化衝擊與身心整頓之過程，使其內在悲愁昇華為創作養份。

本文以王鼎鈞赴美後的創作：《海水天涯中國人》、《看不透的城市》二書為研究對象，探討王鼎鈞的移民書寫與多重位移後的後遺民意識。移民在原居地與移居地之間擺盪來回，各有其適應方式與過程。然而，漂流終究告結，「空間」最終將為「地方」，王鼎鈞的轉變與書寫呼應了文學中亙古的「漂流」主題，也開展寬廣的跨文化向度。

關鍵字：王鼎鈞、後遺民、移民、跨文化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任教於新北市立板橋高中國文科。

一、前言

20 世紀的華人社會籠罩在政治版圖反覆分合的歷程中，國家、民族、文化等諸多認同面向在文學中亦折射出多重角度的姿采。生於彼岸、落於此地者不知凡幾，而遠走他鄉、靈根自植的飄零花果各有生存姿態。如果聶華苓的自比是跨境書寫者的大致樣貌，¹以兩岸四地為原鄉，在世界各地賡續書寫的文人隊伍亦愈益壯闊，奔騰著無限蓬勃的生機。

其中王鼎鈞（1925~）的經歷與書寫極具代表性，王鼎鈞的文學生命橫越了兩個世紀，結構了多重場域的文學因緣。他出生於山東蘭陵，1942 年在對日抗戰背景下離開家鄉，成為流亡學生，初嚐漂泊羈旅之味；爾後 1949 年國共對戰時，隨著蔣氏政府抵達臺灣基隆。25 歲的青年王鼎鈞歷經數次遷徙的憂患，而臺灣成為一處暫時安居的桃源，他在參與各項文藝工作中穩定下來，諸如：接受張道藩在中國文藝協會的「小說創作研究組」訓練，進入中國廣播公司（臺灣廣播電台）工作；加入《軍中文藝》、《掃蕩報》、《公論報》等報刊之編輯行列，並與《中國時報》的高信疆、《聯合報》的痾弦、《中華日報》的蔡文甫合作，大量投稿至副刊……等。在廣播文學與副刊盛行的 60-70 年代，王鼎鈞躬逢其盛，在臺灣奠定了文學根基，爾後，1978 年自中國廣播公司辦理退休，做了一項影響其人生觀與文學視野的重要決定——接受美國西東大學編寫雙語教材之聘約，赴美國新澤西州安居。

不同的境遇與碰撞勾勒了王鼎鈞的生活背景與書寫向度：他在 1963 年出版了第一本書《文路》，其後 1975 年爾雅出版社發行了「人生三書」，為王鼎鈞在文壇奠定了重要地位，而「作文四書」更廣受文藝界與教育界歡迎，²不僅為社會大眾指示光明的人生觀，亦為莘莘學子引導寫作的明徑。至於 1980 年代以降，臺灣文壇走向多元共存、眾聲喧嘩之際，他便逐漸挖掘內在世界，出版了富含哲學寓意、飽滿抒情向度的《碎琉璃》，寫出他回少遠離山東故土、避戰赴臺的遷徙點滴；待其赴美之後，他出版了《海水天涯中國人》、《看不透的城市》二書，寫下眾多移民的生活面貌，這也是他告別臺灣的深情回望。³

王鼎鈞在《文學江湖》中提到，從《碎琉璃》一書開始，他的寫作才開始有了自己的風格，如果沒有離開臺灣，他筆下的文學樣貌則幾已奠定，因此移民的

¹ 聶華苓：「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聶華苓：《三輩子》（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年 9 月），頁 3。

² 人生三書為《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等，作文四書為《靈感》、《文學種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等。

選擇也就成了文學路上的重要轉折，空間的位移使他從清淡閒適的心境，一轉而為孤寂淒冷：「沒想到全家移民，一去三萬里、心腸非故時，生活況味由『深巷明朝賣杏花』變成『揀盡寒枝不肯棲』。」⁴如果連結王鼎鈞所有的移動歷程，那麼一次又一次的異地經驗都是生活模式、倫理文化、感情結構的激盪與沖刷，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之旅。王鼎鈞的心境經歷數度波瀾轉折後，文思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在綿密細緻的抒情鉅作《左心房漩渦》問世後，他的文學生命又攀向另一座高峰；直至「回憶錄四部曲」問世後，⁵王鼎鈞嚮慕以久的「傳世文學」於焉完成。⁶

他從中國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前半生是從中國大陸遷徙至臺灣的移民，後半生則成為移居美國的移民。跨越地理界線的同時，也跨越了不同文化的向度。⁷跨文化著重於各種文化相互影響、混雜、交融的現象，辛金順就指出：「而出國，或留學域外，其實是一種『跨文化』的翻譯行為，即以身體，銘寫著兩種文化的對話與調整而產生出新的意識與體驗。」⁸童年流亡與青年離散的經驗固然影響了王鼎鈞的憂患意識，然而他所隱藏的漂泊創傷在渡海來台之際卻並未迸裂，反而是中年之際移民的選擇使其心神為之動搖，王鼎鈞自言：

其實，有些早年的生活經驗，一些困頓流離的情境，早在心中醞釀，就像青年時的流亡經驗，一直到旅居美國後，感受到新的刺激，而在平靜中開始回憶縷述，才剖露了深埋的礦脈。⁹

究其原因，乃因為移民使王鼎鈞面臨了人生最大的平衡問題，也就是必須在中國性／美國性的夾縫中尋找平衡，因此擺盪在華／夷衝突、內／外秩序的對立中，

⁴ 王鼎鈞：《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8年6月），頁474。

⁵ 四部曲分別是：《昨天的雲》（1992）、《怒目少年》（1995）、《關山奪路》（2005）、《文學江湖》（2009）。

⁶ 王鼎鈞在〈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上）〉中提到：「我認為文章水準有三個層次，首先是『職業認可』，我在中廣公司、中國時報都算好手，第二是『社會認可』，臺灣各報館各電台都願意用我的稿子，最後是『歷史認可』，作品進入選本，名字進入文學史……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學，有傳世的文學。酬世文章在手在口，傳世的文章在心在魂，作家必須有酬世之量，傳世之志。」見氏著：《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頁456-457。

⁷ 跨文化理論是古巴人類學家費爾南多·奧爾蒂茲（Fernando Ortiz, 1881-1960）於1940年代所創造的概念，他認為跨文化是一段極為複雜的文化移植過程；到了1960年代，阿根廷裔墨西哥籍的哲學家恩立克·杜賽爾（Enrique Dussel, 1934-2023）亦發展其跨文化理論，他延續費爾南多·奧爾蒂茲的思維，主張雙重文化的接觸是彼此「創造性轉化」的過程。

⁸ 辛金順：《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年3月），頁243。

⁹ 王鼎鈞：《左心房漩渦》（臺北：爾雅出版社，1988年5月），頁236。

必須為了重新建構生命的方向與生活的慣性而失落、疲憊。美國的「文明」對他而言，是一場靈魂的革命，他是在身在異邦之後，才驚悟中國文化於己浸潤之深，而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樣貌竟是如此相似、也各有其如此獨特的姿態。而王鼎鈞則是作繭自縛般，看不透異國城市的萬奇事物，於是文學再度成為生命苦悶的象徵、鬱挫的昇華；是故，綜觀王鼎鈞的生命經驗，我們不妨視他的移民書寫為文學生涯的一大轉折。

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王鼎鈞對移動的經驗、鄉愁的書寫，直至赴美之際才姍姍來遲？黃萬華亦觀察到他的「後知後覺」：

王鼎鈞曾直言「鄉愁是美學」，1950年代，「大家初來臺灣的時候思鄉說愁甚為流行」時，王鼎鈞珍藏鄉愁未多言說；到了1970年代，在臺灣「鄉愁有漸成禁忌之勢」時，王鼎鈞卻「後知後覺」「拿它大做文章」。¹⁰

其實，在王鼎鈞開始寫作的年代——也就是1950年代之際，彼時鄉愁美學大行其道，國民黨政府倡導的反共思想與懷鄉意識緊緊相連，古遠清就提到：「其實當時『戰鬥』和『懷鄉』是緊緊連結在一起的」，在臺灣統稱為『反共懷鄉文學』。¹¹王鼎鈞曾自認為無力勝荷：「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¹²王鼎鈞在臺之際沒有寫出對中國的思念，卻在美國寫出濃厚的家國情懷，在他理解中，臺灣與中國畢竟「同文同種」，文化之「根」似乎就在不遠的對岸。然而，移民到美國的王鼎鈞意識到自己除了成為國界上的「移民」，巨大的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的斷裂、語言文字的隔絕等，均使他產生了焦慮與失落，所謂「中國」、「原鄉」便不僅僅是對地理位置的指認，更成為文化符徵與心靈的依歸，這提醒了王鼎鈞：他亦是一名「久經喪亂」的「後遺民」，而《海水天涯中國人》、《看不透的城市》二書便呈現了自己對移民生活的細膩觀察，成為他在美國受到文化撞擊之際重要的代表作。

在王鼎鈞移民書寫的研究中，黃雅莉與姚嘉為都曾細膩地進行分析。黃雅莉秉持「知人論世」的理念，運用紮實的文本分析，指出王鼎鈞從「邊緣人」、「弱者」的視角出發，寫出部分華人渴望進入美國文化核心的掙扎與努力；而姚嘉為觀察北美文壇動態，擬定許多關鍵問題與王鼎鈞深入詳談，詳細記錄了作家創作

¹⁰ 黃萬華：〈文學史上的王鼎鈞〉，見張春榮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王鼎鈞》（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12月），頁157。

¹¹ 古遠清：《從陸臺港到世界華文文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2年7月），頁69。

¹² 王鼎鈞：《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頁133。

時的社會情態與心路歷程。筆者試圖賡續前人的研究成果，關注王鼎鈞《海水天涯中國人》、《看不透的城市》二書，試圖分析王鼎鈞的「移民經驗」與「後遺民意識」如何產生對話與連結，而王鼎鈞筆下的移民社群又是如何在原鄉與異地之間尋求平衡，產生跨文化對話與交流。

二、時空錯置：王鼎鈞移民書寫中的後遺民意識

《海水天涯中國人》一書分為「匆匆中南美」與「紐約筆記」兩部分，是王鼎鈞初至美洲大陸的紀錄；前者書寫他自舊金山入境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巴拿馬、秘魯等國家的經歷，後者描寫定居紐約所遭遇的人事物。至於《看不透的城市》共有 19 篇散文，書寫華人移民至紐約的在地社會生活，其後附有方覺天等七位作者的生活記事。

在華語語系的討論中，王德威曾以「移民」、「夷民」與「遺民」等詞彙討論世界各地華人的生活型態，並提出三者之間的關係：

華人投身海外，基本身份是離境的、漂泊的「移民」。而年深日久，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子女融入了地區的文化，真就成為外國人，就是我所謂的「夷民」。但還是有一種海外華語發聲姿態，那就是拒絕融入移居的文化裡，不論如何，仍然堅持「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想像，形成所謂「遺民」。

13

中國多難的歷史與多戰的土地使華人遠離家鄉，在《海水天涯中國人》與《看不透的城市》一書中所出現的移民大部分是願意「入境隨俗」的「夷民」，他們在動盪之中離開中國，泰半是為了追求更自由、開放的生活環境，王鼎鈞書中亦揭示了此核心意識：

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國家，都是由於後面有一根針刺他。印地安人離開亞洲，也是因為後面有根針嗎？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國人。照她的說法，中國是個多針的國家？¹⁴

在王鼎鈞初至美國的 1978 年，美國少數民族的「尋根熱」熱潮尚未平息，以黑

¹³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26-27。

¹⁴ 王鼎鈞：《海水天涯中國人》（臺北：爾雅出版社，1982 年 11 月），頁 29-30。

人為主流的尋根運動方興未艾之際，王鼎鈞好奇何以華人不甚熱衷，透過一名久居當地的華人之口得知，乃是因為美國雖有種族歧視，使華人在異地受盡苦頭，然而中國長期以來戰亂、憂患與經濟動盪帶來的紛擾不安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王鼎鈞觀察到：美洲處處皆有中國人的身影，乃因為中國的苦難不斷，是故移民亦一波波紛至沓來。

移民的移居動機與異地生存的適應過程是王鼎鈞極為關注的現象，透過書寫，王鼎鈞亦一步步進行自我心境的探索與挖掘。在《海水天涯中國人》序文〈牢籠・天井・蠶〉中，可以見到王鼎鈞運用飽含象徵性的抒情筆法自道胸臆，敘述其移民前後的心境變化。文中提及，他幼時眺望遠山，總遙想著山外風景的心情，於是他渴望從山中出走；然而，步出山外，卻發現自己其實不曾離開山群，因為山外又是另一列遠山；在奔波途中，「我」竟成了另一種姿態——一種風塵僕僕的動物，癱瘓在天井裡。山外原來不曾海闊天空，而是另外一座牢籠。王鼎鈞領悟到：這些苦痛就如同蠶的作繭自縛，然而蠶一生只結一次繭，人卻可能數次受困。遠離家園、出走異邦的行為看似擁有選擇，然而，每一次出走，卻似乎更加悖離了安頓的可能。於是，人總是在山中渴望山外，然而山與山都自為天地，於是人持續行進、游離，恆常處於動盪變卦中，而無法有真正的歸屬。

於此，我們要進一步追問：這樣的「繭」只是一種空間的限制嗎？或者，也是時間的陰影？蔡倩茹的理解提供了一種思考的可能，她在剖析王鼎鈞的書寫意識與家國情結時，認為人類在追索原鄉的過程帶來了鄉愁，而那個原鄉正是生命原始的美好樂園：

樂園之失有兩種，一為短暫的離開，但並不宣告樂園的空間已失，因為「家」還未破，「國」尚未失。……抗日的流亡其實是一場啟蒙儀式，還可存歸鄉的希望。不過，一旦遷台，有形的海峽隔絕歸鄉路，無形的政治對立氛圍，更使樂園愈離愈遠。¹⁵

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大批離散者自中國四面八方而來，他們大半是將臺灣作為暫留之地，對王鼎鈞而言亦若是，記憶中的樂園——家鄉所在，當然是山東蘭陵，作為一個明確的地理位置與想像座標，可望不可即的家鄉更指涉時間意義的存有與往昔記憶的集合。蔡倩茹指出，在政府開放返鄉探親後，王鼎鈞始終沒有重回蘭陵，乃是因為他認為原鄉在過去一切時、空交錯、種種條件並兼具時才得以存

¹⁵ 蔡倩茹：《王鼎鈞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2年7月），頁91。

有：「並不單純指某一地理空間，而是要特別凝定在某一時間點上，且知交故舊故習固在的文化空間，缺一不可。」¹⁶王鼎鈞不願返鄉探親，他自知家鄉早已不在，而臺灣恰好是中國的投影，權作暫定的故鄉與移植的家園，居處臺灣恰能懷抱著一絲絲若即若離的美好想像。然而在移民赴美之後，由於與移居地的語言文化產生隔閡，表達與思考的方式受到阻礙隔絕，因此積累了諸多年歲的樂園想像與追憶傷逝的拉鋸牽扯，終於宣告時空錯置、新舊斷裂。這樣一種對於舊有時空情境的眷戀不捨，便是「後遺民」的情懷。

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中提到，遺民形象自商周時期便已有之，作為一種政治身分，在主權更易紛雜的臺灣更有著豐富的遺民論述。就歷史的眼光視之，在「現代性」的視角下，遺民已經「不合時宜」，於是更進一步產生了無從追尋主源的、被時空遠拋在後的「後遺民」意識：

作為已逝的政治、文化的悼亡者，遺民的意義恰好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搖搖欲墜的邊緣。就此，後「遺」民的後就頗有自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但事實不然。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可能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¹⁷

而這樣的轉換是在空間的移動中逐漸形成的，也就是經歷了不同文化空間帶來的衝擊之後，位移的主體終於明白時間的消逝、慣習的泯除。侯如綺指出王德威的後遺民之說具有離散觀點的彈性：

王德威繼承中國文化的傳統，結合了離散概念，開展出「後遺民」的說法。在其說法裡，特別強調的是遺民寫作中不合時宜的心態、文化想像的解體、記憶與遺忘的糾纏。後遺民之說，應可視為是離散的一種彈性解釋。……另外，離散者在時空位置上的錯置，飽嘗身心剝離的痛苦，因此對於現況有著局外人的清醒，反而因此在某個程度上培養出多元視角，能對寄居地文化加以批判、改造或顛覆。¹⁸

¹⁶ 同上註，頁 110。

¹⁷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11 月），頁 47-48。

¹⁸ 侯如綺：《雙鄉之間：臺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年 6 月），頁 25。

無論是王德威或是侯如綺的觀點，都同樣指向了一種「遠離故鄉」的傷逝之感——在空間向度上，王鼎鈞身在美國，在時間向度上，他開啟了遲到的鄉愁。王德威更進一步言說：「我也以為後遺民心態瀰漫在華語語系的世界裡，成為海外華人持續（已經失去的，從未存在的）『正統』的中國最大動力。」¹⁹而王鼎鈞所思考的中國意象究竟為何？這攸關乎他筆下華人生活的寫照。他曾透過一名老奶奶所仰望的壁畫，再現他想像中的中國形象——那是巨大、失根、超越承載的一棵大樹：

巨大的壁畫，一棵枝桠粗壯的大樹，樹上纍纍的不是花果，是中國人，還有房子，男女老幼中國人撐破了房子，伸出頭來。整棵樹沒有根，頭太重，你擔心它怎麼能站穩。²⁰

至於中國人，則是歷經苦痛、卻在時間的傷痕中累積智慧的群體：「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歷史，經過無數災難，中國人從災難中增加了許多智慧，其中之一就是隱藏自己的痛苦。」²¹無論是《海水天涯中國人》或是《看不透的城市》，「中國」具有悠長的歷史、豐厚的文化，是移民亟欲遠離的苦難之地，也是至親所在的鄉土。

不只是幅員廣袤的美國，王鼎鈞的行腳甚至遠至中南美洲，在王鼎鈞筆下不同地域、不同的身分的華人，各自有著背景迥異的移民動機，也在移民之後展開具有挑戰的在地生活。為了開枝展葉，他們試圖埋藏原鄉的根種，重組文化的基因，在「中國性」與「美國性」之間漂泊擺盪、迂迴不已。他們踏上了前所未有的浩瀚之旅，渴望「成為美國人」，然而「中國魂」卻總是不曾停歇地「干擾」他們，甚至趨之不去，進而曖昧相隨。被抑制的中國性其實最容易因為移居者與故舊的相交重逢，或度過節慶習俗、或遭遇不平之種族待遇之際受到召喚重返。對運筆維生的文學家王鼎鈞而言，依傍語言文字表達自我的路徑其實最容易與所謂的中國性「狹路相逢」。

誠如王鼎鈞書名之喻——《海水天涯中國人》，海水、天涯都有華人的足跡，如果將移民比之於海水，那麼海水可以是起點，是無邊豐沛的泉源，海水也可以散作浪花、遁入沙塵之中；遍佈海水天涯的中國移民是王鼎鈞著意進行的命題，

¹⁹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年12月），頁11-37。

²⁰ 王鼎鈞：〈如是我見〉，收於《海水天涯中國人》，頁5-6。

²¹ 王鼎鈞：〈黑白是非〉，收於《海水天涯中國人》，頁111。

他筆下的移民往往一面努力適應異地生活、一面又用原有的眼光批判當下時空，在道德意識、習俗律法、思維模式等層面產生種種扞格，這些移民通過移動之後，必然經歷舊有慣習改造的過程，才得以成為美國人，這也是在時間與空間的雙重置換下逐步「在地化」的必然歷程。

三、「山外」的想像與再現：移民生態書寫

王鼎鈞在旅居中南美洲、定居美國之際，生活習慣幡然改變，因此身心面臨了巨大的考驗；他透過觀察、採訪各地華人的生活情態，運用文字鋪陳眾人生命歷程，同時也紀錄自己的心靈變化。《海水天涯中國人》序文中，王鼎鈞以海水意象寫出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中國人最像海水了，一波一波離開海岸，退入一片蒼茫，一波一波衝上岸去，吮吸陌生的土地。」²²渴望「山外」是移民意欲遠離苦難的普遍寫照，然而海水彼岸卻不一定是理想中的生活樂土，王鼎鈞所指既是他 1949 年漂流至臺灣，亦是他 1978 年移民至美國的經歷，更是 19 世紀以來移居至世界各地的華人共相。

移民潮是一股股不同推力／拉力作用構成的現象，赴美的華人前仆後繼，這些熱潮包含：第一波於 19 世紀中葉受到淘金產業影響，華人前往尋求發展；第二波乃因 1960 年代美國放寬移民條件，而當時臺灣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不少人因此前往求學、就業；第三波則是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並與美國正式建交，於是美國產生更多華人移民。劉登翰認為移民社群兼具「原居地」與「移居地」的雙重性，既對母土形成「離散」現象，也在海外產生「聚合」：

他的膚色、他的語言、以及他的文化——從心理到行為，是一種無形的紐帶，將他們「歸納」在一起……海外華人的「散居」，實際上是一種「離散的聚合」。「離散」是相對於他們的母土，而「聚合」則是相對於他們自海外的生活方式。²³

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各有其遷徙情境、世代差異，亦有其文化參與模式。華人移民在嘗試融入當地社會、拓展生活面向時，必然在新舊價值之間有所取捨，在這些往來、應對、進退、擺盪之下，文化也歷經了保存、改變、承繼、斷裂、擴充或壓縮等變化。

而中國文化的涵義究竟為何？葛兆光在《宅茲中國》中指出：「在中國，並

²² 王鼎鈞：《海水天涯中國人》，頁 5。

²³ 劉登翰：《跨域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 3 月），頁 9-10。

非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像。」²⁴他更進一步提出：「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²⁵隨著 19、20 世紀以降華人移動赴美，中國文化也透過移民而呈現出不同於中國本土的樣態。黃秀玲則指出，在全球化的年代，移民的形式可以區分為三種：心懷故土的「本源中心主義」(genocentrism)、行腳天下的「跨地域主義」(translocation)、及靈根自植的「扎根主義」(racinationism)。²⁶這三種模式並非相互對立的存在，而是有可能同時、同地共構而成的。筆者則認為，這三種模式亦是程度之別，移民於舉手投足間所代表的文化習慣，都透過與「他者」接觸頻繁程度而展開或深或淺、或多或少的轉變；而屬於華人群體所共同享有的價值、理念，在經過遷徙、離散、漂泊的過程後，其深層結構仍具有效力與能量，這些文化元素亦可能會以嶄新的方式呈現核心價值，並成為移民社群的心靈依託。

在王鼎鈞的觀察中，華人社群的價值觀在與異文化相接時產生紛歧，在移民世代之間亦產生了認知與行為的落差。在《看不透的城市》中，可以看到居住在紐約的華人移民適應、抗拒、迎合、妥協，並進而改變或不變的過程。如〈崔記三門〉一文中，「老崔」是一位對美國教育抱持質疑態度的中國家長，他恪守中國文化固有的「溫柔敦厚」之道，卻得不到預期的實質反饋；在〈怨〉一文中，更可以看到主人翁凡事講求忍讓的中國文化特質，因此在主動爭取個人權益的美國環境中顯得格格不入。至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社會制度與物質文化的差異，在〈春至〉一文中則有相當直接尖銳的暴露：

一般美國人千萬不能失業，別看他們住洋房，鋪草坪，坐汽車，開暖氣，這些多半是由分期付款而來。他們一生寅吃卯糧。他們擺闊，也一直發窘，一旦失業，父子不相顧，兄弟姐妹陌路，人人自顧不暇，栖栖惶惶，沒有應變的彈性。唯一的安全感是保險，病了靠醫藥保險，死了靠人壽保險，老了靠社會保險。在未老未死未病之前，保險費是一筆負擔，是所謂「吸血的水蛭」，而分期付款是所謂凌遲生命。生活是個玲瓏的框架，稍有壓擠震搖，架子就塌了。²⁷

²⁴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 3 月），頁 28。

²⁵ 同上註，頁 32。

²⁶ 黃秀玲：〈全球視野與在地性：一個華美研究學者眼中的世界華文／華人文學〉，《中山人文學報》第 40 期（2016 年 1 月），頁 36。

²⁷ 王鼎鈞：〈春至〉，收於《看不透的城市》（臺北：爾雅出版社，1984 年 5 月），頁 54。

美國人生活型態上往往依賴貸款與保險，這種消費意識構成的價值觀念與經濟結構，自然對華人產生震撼與衝擊，也使王鼎鈞開啟社會制度與人情倫理的思考。

在〈門前雪〉一文中，王鼎鈞觀察到美國人在生活上「自掃門前雪」的生活態度，美國冬天多半會下雪，而美國人在鏟雪的時候只會負責自家居所範圍，和他人之間始終界限分明，即便是兄弟姊妹之間亦是如此；相較於中國傳統文化上「敦親睦鄰」的訓示，美國人不願倚靠他人，更不願意插手他人事務，因此在人際上便是平等、開放、以禮為上的模式：

「各人」自掃門前雪並不是一句反話，試想，倘若混合剷雪或者輪流合併剷雪，必定有人覺得自己剷寬了、別人剷窄了，或是自己剷長了、別人剷短了，或是自己次數多、別人次數少，暗中滋生抱怨和不平，在功過難分勞逸難均的大鍋菜中，人人都以為別人多夾走了一塊肉，大家非但不能增長感情，結果恐怕適得其反。²⁸

美國的「自掃門前雪」與中國的「敦親睦鄰」兩者之間，不僅是待人處世之道的距離，更是文化價值根基的差異；另一篇〈保母的經驗〉亦明確道出美國人的立身之道：「一般說來，美國流行的大眾哲學是要人為自己著想，也就是『利己』。」²⁹因此移民在適應新生活時候，往往習慣用自身的價值觀衡量對方、為對方思考，並渴望得到對方理解與協助，結果卻得不到預期的反饋，這也是造成他們在異鄉委屈求全、心懷不平的原因。

另一方面，移民之間自有其互動模式，他們會彼此幫助，也相互傾軋，如在〈他們開店〉一文，可以見到移民為了生存而相互傾軋的殘酷現實，由於了解華人特性與弱點，因此加以利用、相殘。〈天風迢〉一文中藉由好友老陶之語，直截指出移民圈中心人的險惡：「中國城是個欺生的地方，我不能讓人家一眼看出來我是個新人。」³⁰王鼎鈞對於移民之間的人際互動亦相當關注，他訪問了在美國經營餐飲業 20 餘年的老闆，並提出唐人街與華人之間利害關係的疑問，對方一語道出：

倘若沒有唐人街提供臨時工作的機會，很多留學生無法完成他的學業，這

²⁸ 王鼎鈞：〈門前雪〉，收於《看不透的城市》，頁 131-132。

²⁹ 王鼎鈞：〈保母的經驗〉，收於《海水天涯中國人》，頁 191。

³⁰ 王鼎鈞：〈天風迢〉，收於《看不透的城市》，頁 125。

是事實。不僅此也，那遭偷遭搶沒錢買機票回國的，那投奔親友吃了閉門羹流落異地的，那失業破產徐圖東山再起的，唐人街都扶了他一下，拉了他一把。³¹

王鼎鈞透過此語指出：在異地生活，便必須理解並沒有放諸四海的尺度與標準，華人之間的社群也自有文化生態與相應的處世之道；〈古今浮沉〉一文中，王鼎鈞透過一名在秘魯的華人表達身為海外華人社群的運作模式，並不是同為華人就可以界定彼此休戚與共，也並非兩者出身不同，就注定分道揚鑣：

人是有圈子的，中國人沒有圈子嗎？山東人沒有圈子嗎？地位相同的人是一個圈子，利害相關的人又是一個圈子，圈子連圈子，圈子套圈子，人一生在別人的圈子裡鑽進鑽出，鑽累了再回到自己的圈子裡休息。³²

所謂「圈子」便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在華人移民的世界中，他們固然會與血緣接近、族群相似者形成共同的社群網絡，也會在不同利害關係、社會經濟基礎上與他者建立連結。王鼎鈞亦曾提到，他在巴拿馬的好友之子視投入移居地的政治活動作為融入的方式，因為華人在新的土地生根實屬不易，如果無法融入社會，既遠離家鄉，又永為異客，便會造成「老一代還可以抱殘守闕找安慰，下一代孤苦伶仃沒有歸屬感。」³³的結果。

在社群運作之外，王鼎鈞亦觀察了華人看待傳統節慶的態度與傳承模式。在〈關於月餅〉一文中，主角在中秋節前夕特別開了兩個半小時的車前往唐人街購買月餅，並透過月餅勾勒出自己在童年時隨父親逃難的往事，月餅成為乘載其甜蜜記憶與苦難歷史的存在，然而，對於主角女兒而言，中秋節及月餅所象徵的團圓意義與飲食記憶卻不復存焉：

女兒一下子就換了習慣。今天動身出門的時候，告訴她有月餅可吃，瞧她的冷淡！棗泥、豆沙、五仁、百果，可都是咱們的山川靈秀之氣！都是日月精華！是世態人情傳說掌故！你這一口咬下去，可就腳踏實地、做成個炎黃世胄！這些，女兒怎懂？怎懂？³⁴

³¹ 王鼎鈞：〈那年冬天〉，收於《看不透的城市》，頁 187。

³² 王鼎鈞：〈古今浮沉〉，收於《海水天涯中國人》，頁 81。

³³ 王鼎鈞：〈黑白是非〉，收於《海水天涯中國人》，頁 98。

³⁴ 王鼎鈞：〈關於月餅〉，收於《看不透的城市》，頁 38。

中秋節在許多中國人身心銘刻了「天涯共此時」、「千里共嬋娟」的文化意義，然這一份記憶亦必須透過「物」與「人」的雙重實踐才得以延續。

不管是倫理社群關係的親疏與辯證、節慶意涵的再生與斷裂，王鼎鈞捕捉了移民細微的情感，反映移民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保持關係、建構認同，這其實亦反映了王鼎鈞內心深處的關懷與焦慮，他在接受廖玉蕙的訪談時，曾指出在北美寫作時「感受很深的是看到瑪雅文化的覆滅，為中國文化擔憂。」³⁵進一步言之，王鼎鈞不只是純粹紀錄北美移民生活見聞，他認為文化人的道德責任在於以宏觀的文心思索中國文化在 20 世紀的弱化與消解；其實，文化自有其蛻變與融合的模式，黃英哲便認為：

在這樣的大變動時期，卻同時也是文化重組與再生產的年代……從文化傳播的路徑來看，自願或他力導致的移動或漂泊，卻也產生打破地域壁壘劃分的可能性。……重層的歷史與多重的邊界，形成了生活在其中的，擁有跨境能力的社會資本與主觀意願的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展開其自主性的漂泊之旅。³⁶

文化本質其實充滿變動性與混雜性，中國文化原本就不是「純種」模式，在政治外交演變繁複、移民遷徙不斷的當代社會，以國家民族為核心號召與導向的文化認同模式亦將漸漸失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共構、融合再造的生產模式，這雖然使認同趨向複雜化，卻也使得文化內涵更趨豐富，同時，這也形成了王鼎鈞及其時代人群必須面對的心靈考驗。

四、終期有盡：漂流、適應與轉化

《海水天涯中國人》與《看不透的城市》二書展現了王鼎鈞對漂流的態度、對原鄉的思念，更勾勒出華人移民社群的焦慮與適應過程，這不僅改變作家既有的文學軸向，亦擴充了華人的書寫版圖。何寄澎認為王鼎鈞的「漂流意識」使其散文觸及了時代的重要主題，而這一層漂流意識亦為中國藝術主題中亙古的傳統之一：

³⁵ 廖玉蕙：〈到紐約，走訪補蝶人〉，收於張春榮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王鼎鈞》（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年 12 月），頁 121。

³⁶ 黃英哲：〈漂泊（Drifting）〉，收於王驥懋等著、史書美等編：《臺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 年 3 月），頁 304。

整個古典文學傳統，漂流意識其實是一直存在的。在每一個不同朝代更替時，我們看到；在古代士人的仕宦輾轉流離中也會看到。但是，我們也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來，因朝代更替而起的漂流意識，或者是文人生涯宦途羈旅的漂泊，完全跟王鼎鈞的漂流意識不可同日而語。換言之，王鼎鈞所呈現的漂流意識，其實是一個民族、一群同樣流著相同血液的人，共同橫跨了一個世紀這麼長的漂流——這是百年來因中國變動所造成的流離失所，所造成的羈旅漂泊。³⁷

因此，王鼎鈞筆下的「漂流感」不只是個體的憂思苦難，更具有強烈的歷史意義與文學史價值，古遠清亦肯定：「和濃烈的中國情結相聯繫的是，王鼎鈞散文有豐厚的歷史感。」³⁸因為王鼎鈞自離開蘭陵家鄉始，始終在漂流的路上，他的經歷見證了國家的、或是民族的歷史，甚至是 20 世紀的人類史。

王鼎鈞的童年與青年在中國，中年在臺灣，晚年在美國，無論是中國、臺灣、美國，王鼎鈞與不同土地的連結都積累了數十年之久，並投射不同的時間記憶與認同情感。相異之地所形塑的感覺結構總與人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而人類心靈與空間的連結一旦斷裂，便會遭受離散之苦。范銘如便曾提到：

身分與空間的連結永遠無法固定。它會受到主體各種身分間競逐矛盾的影響而產生變動，也會受到主體不同生命階段的空間歷程、時代社會語境的衝擊而產生板塊裂解和升沉。個人在每個生命階段都會有觀看上的差別，時代世代的感覺結構更有差異。如此積累錯疊，反覆刮除重寫再現。身分地理不僅彼此進行同時性的推擠並列，還在歷時性的變化中多層次堆砌。身分空間的本原無法追溯重建，它反映的是當下時空語境的認知、詮釋、需求、慾望或匱乏。³⁹

人對土地的認同轉換到異地的同時，不僅是對移居地的接受納入、也是對原居地的拔根失落。

然而，我們觀察王鼎鈞作品中所反映的現象，可以發現移民的「改變」多於

³⁷ 何寄澎：《永遠的搜索：臺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年 6 月），頁 167。

³⁸ 古遠清：《從陸臺港到世界華文文學》，頁 309。

³⁹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年 7 月），頁 95。

「不變」。他們的移動泰半是為了追尋更理想的生活環境而來，他們為了自己、更為了下一代子孫的未來，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移居地的時間意識與空間感受促使他們的身心由內而外逐步適應。所有移民或多或少都經歷過「原居地」與「移居地」之間拉扯的過程，如〈茶話〉一文，主角雖與家鄉故舊透過書信保持聯繫，但是他的靈魂——也就是根，卻依舊漸漸散佚：

不過這幾年我常常跟家裡的人通信，我每寄一封信就是寄出去一小「塊」靈魂，收信的人把我的靈魂留下，另外揀一小「塊」靈魂回來，這樣魚雁往返的結果，我就像是一部舊車，外殼還在，裡頭是機器零件都換了雜牌了。⁴⁰

無論這些移民移動的動機、過程為何，他們與家鄉的連結似乎愈益鬆散，與移居地之間的連結則愈見穩固。黃雅莉亦提到：「王鼎鈞正是通過對尋根意識地追索和終極關懷的探求結束了無垠的困惑和迷茫，擺脫了他身為邊緣人的苦悶和徬徨，從人性的角度對人類的共性給予了深刻揭示。」⁴¹王鼎鈞直指移民之所以漸漸在地化的原因：「當然，距離不是由於時間，而是由於地理和國籍。那些是非得失畢竟隔著半個地球，無關他們的直接利害。那原來的國度已是他們童年的鞋子。」⁴²在移居地面臨的種種生活情境是必須及時處理的，因此家鄉與自身之間的關聯不再有直接的利害糾葛，而只能是情感式的悼亡、追想。

其實，移民在離散之後，必然具有與空間重新建構密切關係的能力，他們在時間的日積月累之後，必然逐漸「在地化」，而最好的催化劑在於「自我適應」的能力。王鼎鈞在〈適應吧〉一文中，便直接揭示自己在美國觀察所得：「境由心造。美國可能是地獄，也可能不是地獄，全看個人的心情。」⁴³移民的離散固然帶來身心的動盪不居，然而此亦是一種過度的狀態。「原居地」與「移居地」是移民嘗試建立平衡的兩端，移居者亦會因為其所遭遇的生存變化而縮短、或延長適應的時間，然而無論是何者，終將適應於移居地，華人移民後裔歷史學者張純如便指出：

說到底，華人所遇到的問題與其他移民沒兩樣，都是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

⁴⁰ 王鼎鈞：〈茶話〉，收於《看不透的城市》，頁 148。

⁴¹ 黃雅莉：《漂泊與尋找：王鼎鈞自傳書寫的詩心與文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9 年 5 月），頁 333。

⁴² 王鼎鈞：〈那年冬天〉，收於《看不透的城市》，頁 184。

⁴³ 王鼎鈞：〈適應吧〉，收於《海水天涯中國人》，頁 142。

問題：為了餬口，為了提供食物、住處與好的教育機會給孩子們，他們必須不斷努力和掙扎，在這變動不居的世界裡，為了維護珍視的價值，他們殫精竭慮。在失去故土後，剛開始來到新的國度時，任何人都不願放棄那些在過去文化背景中養成的習慣，不願意與人建立新關係——結果多年後才發現自己早已放棄那些習慣，而且也不斷建立新關係。⁴⁴

她認為無論願意與否，適應與重建都是不可免的過程，史書美亦指出：

移民者指的是從一個地理區域移出到另一個地理區域的人，在心理上須要把原居國從經驗生活的「地方」，變成抽象的、象徵性的「空間」，它已然是過去的空間，帶著一系列從鄉愁到否定的新心靈投資，端視個人的經驗，以及當初離開原居國的理由而各有不同；相對地，移民後的國度從想像的、抽象的「空間」，變成了每天生活的「地方」，不管是幸福美滿或危機四伏，移民者都必須在此活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昔日原本居於未來的「空間」，也就是移民國，轉變成眼前的、當下的「地方」。⁴⁵

史書美運用了段義孚的空間觀念，說明移民在移居異地後必然經歷的雙重轉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將使原居地從「地方」轉為「空間」，而移居地亦會從「空間」轉為「地方」，兩種轉變是同時完成的，而轉變的過程亦是適應的過程。

其實，王鼎鈞在回憶錄《關山奪路》中，曾回顧自身的文學因緣與啟蒙，他提到自己在流亡時會閱讀郁達夫，因為「他寫漂泊的經驗很吸引我，他使我覺得漂泊有一種無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寫人在流離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減輕了自己的痛苦。」⁴⁶王鼎鈞亦藉由《海水天涯中國人》與《看不透的城市》中華人移民的遷移際遇，抒發了異地生活所遭遇的扞格與愁苦，移民雖試圖將心靈寄託於記憶中的家園，然而那些曾居住過的地理空間多半是在生活遭遇不順之際片刻的懷想，移民終究在現實的應對往來之中，選擇將生活安頓在當下的時空情境中。王鼎鈞將自身的轉變過程、以及在美華人的生活經歷書寫成章，這不僅是他心境的取向，也是 20 世紀中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⁴⁴ 張純如著、陳榮彬譯：《美國華人史》（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8 年 10 月），頁 14-15。

⁴⁵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年 6 月），頁 200。

⁴⁶ 王鼎鈞：《關山奪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8 年 5 月），頁 223。

五、結語

《海水天涯中國人》與《看不透的城市》二書中呈現的華人移民形象，說明他們遭遇的生活考驗、情感依歸。移民之中有心懷祖國、以己度人者，也有拋棄過往、認同新文化者，王鼎鈞的書寫意識奠基於他對於家園的情感——包含對祖籍山東蘭陵的懷想、對生活了 30 年的臺灣土地的關愛，這些情感連帶引發他對往昔時光與生活慣習的眷戀與思索，成為中國文化的後遺民。無論是王鼎鈞自身、或是他所書寫的移民，皆代表了 20 世紀人類的共相——漂流與離散，而他們終將投入實際生活的地方，化異鄉為故鄉。

綜觀王鼎鈞文字的核心關懷，在於透過自身的經驗，關注移民文化圈的情感流動與生活適應狀態，這群移民並不以中國或美國為中心，他們在兩地之間徘徊，似乎永遠在前進著，間或回望自己的家鄉母土，然而，他們也都有自知之明，必須克服當下的困境，盡可能地建構自己的存在價值。他們在異鄉建構了看待我者／他者的道德尺度、生活價值與理念，不同的職業身分、性別角色，各有其生存之道；《海水天涯中國人》與《看不透的城市》二書皆點出移民在適應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苦辛，也暗示了王鼎鈞在自我生命與文學道路上的轉變歷程。

最後，同為移民赴美的作家的李黎，曾以「拓荒者文學」一詞形容移民文學，此亦可以詮釋王鼎鈞歷經「革命」後的重生：「海外華人的文學不該是流放文學，而是拓荒者的文學，是伸向空中的枝葉投給大地的消息，是來自遙遠的域外的書柬，是檢視這一個遷徙動盪時代的見證與史歌。」⁴⁷是故，王鼎鈞的移民經歷使之開展了自我心靈的空間、中國文化的向度，他對移民的書寫也應屬於美國文學與社會史的珍貴扉頁。

⁴⁷ 李黎：《傾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年 10 月），頁 137。

引用文獻

（一）專書

- 王鼎鈞：《海水天涯中國人》，臺北：爾雅出版社，1982年11月。
- 王鼎鈞：《看不透的城市》，臺北：爾雅出版社，1984年5月。
- 王鼎鈞：《左心房漩渦》，臺北：爾雅出版社，1988年5月。
- 王鼎鈞：《關山奪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8年5月。
- 王鼎鈞：《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8年6月。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11月。
- 王驥懋等著、史書美等編：《臺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3月。
- 古遠清：《從陸台港到世界華文文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2年7月。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年6月。
- 辛金順：《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年3月。
- 李黎：《傾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10月。
- 何寄澎：《永遠的搜索：臺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6月。
- 侯如綺：《雙鄉之間：臺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6月。
-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7月。
- 張春榮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王鼎鈞》，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12月。
- 張純如著、陳榮彬譯：《美國華人史》，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8年10月。
- 黃雅莉：《漂泊與尋找：王鼎鈞自傳書寫的詩心與文境》，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9年5月。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3月。
- 劉登翰：《跨域與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 蔡倩茹：《王鼎鈞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2年7月。
- 聶華苓：《三輩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年9月。

(二) 期刊論文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37。

黃秀玲：〈全球視野與在地性：一個華美研究學者眼中的世界華文／華人文學〉，《中山人文學報》第 40 期，2016 年 1 月，頁 35-61。